中國與世界秩序評論

澄海全球發展與安全
高等研究院
Chenghai Institute of Global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China and the World Order

民主能得到修复吗?

本期作者: 约翰・邓恩（John Dunn）

主编:杨光斌　　总第十五期

（未经允许，不得引用）

澄海全球發展與安全
高等研究院

中國與世界秩序評論

民主能得到修复吗?

本期作者：约翰·邓恩（John Dunn）

主编：杨光斌

总第十五期

澄海全球發展與安全
高等研究院
Chenghai Institute of Global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未经允许，不得引用）

目　录

阅读提示 I

民主能得到修复吗？ 1

注释及参考文献 25

阅读提示

不存在一套自洽的民主理论，因为民主并非一个确定的议题。代议制民主是一种相对现代的政体形式，如今它亟需被重新审视与修正，因为长期以来，众多代议制民主的实例表现不佳。代议制民主如今也是一种日渐老化的政体。

作为一种国家形态，它和任何国家一样，都面临着领土争议与合法性争议。它声称其合法性源于反复的民众选择，但这一主张的可信度正日益受到冲击：它所维护的财产制度再生产出巨大的生活机遇不平等。

公民本就难以判断如何增进共同利益，而信息经济近来的变革更是加剧了这一困境。在气候变化造成的持续破坏中，代议制民主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政体都更为致命的危机，唯有能够及时自我启蒙的公民群体，才有望鼓起勇气应对这一危机。

民主能得到修复吗？

约翰·邓恩

作者：约翰·邓恩（John Dunn），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特聘教授，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士

关键词：代议制民主，政权，公民身份，判断，利益

无论“善”是否有形式，民主无疑是没有的。[1]在当代政治话语中，民主是一个伪装成答案的问题；更糟的是，它是一系列宽泛的问题，却伪装成为所有问题的答案，同时又并未提供任何明确可行的方法来解答其中任何一个问题。而在这样一个时代，人类为自身——不管是单个国家，还是作为一个整体——所制造的危险，已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峻，上述情况依然属实。当然，作为一个概念，民主并非一直承载着这些荒诞的预设，理解它如何以及为何会承载这些预设，固然重要。但更为紧迫的是，我们要清醒认识到这些预设何其荒谬，并由此回溯，重新找回一种不那么混乱、更为稳定的认知，去理解当今地球上每个社会都面临的政治理解与选择问题。

一个有助于认清这种荒谬到了何等程度的办法是，要注意到如今有一大批政治理论家——主要但已不再仅限于美国——自称为民主理论家，专门研究民主是什么、以及

它为何具有如此难以言喻的政治价值。他们中极少有人会无可救药地受制于柏拉图——这不仅仅是因为柏拉图曾如此尖锐地批判过民主——但他们所有人都至少默认：民主确实存在某种形式。否则，他们如何知道该研究什么，又凭什么认为研究民主必然具有如此超凡的价值？如果你费心去考察他们的研究成果，就会毫不意外地发现，他们不仅在研究内容上分歧巨大（这一点本身无可厚非），而且在论证究竟是什么能让任何一种对民主的解读具有如此重大价值这一点上，也收效甚微。严格来看，迄今为止，整个学术领域所提供的政治启示，并不比其经院哲学前辈们为解决一个针尖上能站立多少天使这类问题的努力有意义多少。

今天，我将尝试回答一些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我希望、也相信自己能够给出答案。但我想要探讨的最核心的问题，正是标题中所提出的那个。遗憾的是，这是一个无人能够给出确切答案的问题，然而我们却极其迫切地需要去思考它。首先，因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不只是关于政治的问题，更是置身于政治之中的问题——关乎我们各自、以及在彼此广泛的交往中应当采取何种行动；其次，因为这是一个关乎无数其他人选择做某些事而非其他事所产生的后果的问题。人类甚至无法知晓自身的未来，因为只要未来并非单纯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是在通过自己的选择塑造未来。所有人都在希望与恐惧中做出这些选

择，却永远无法在全知的状态下选择，因为他们永远无法确切知晓，自己最终究竟做了什么，更不用说那些显然会影响他们的其他人最终做了什么。我们所有人在做选择时，必然都处于哲学家约翰·洛克所说的“概然性的黄昏”，而在政治领域，这光芒往往确实极为黯淡。[2]

认为民主亟需重塑的判断，并不预设任何其他现存政体形式在政治健康度上具有明显优势，或在所有相关标准下都具有无可争议的合法性。它仅仅表明一个事实：三十年前，西方代议制民主模式在全球各类社会中所获得的评价，远比如今人们普遍认知的要正面得多。[3]这种支持度的急剧下滑，反映出在众多长期采用西方代议制民主模式的国家，以及过去半个世纪里选择采用该模式的大多数国家中，政府治理表现对其大多数（在许多情况下是越来越多的）公民产生了普遍负面的影响。这反映出财富日益集中在极少数公民手中，同时，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比例不断上升的普通民众，其生活预期却在不断降低。经济增长乏力甚至陷入衰退、收入分配顶端与快速扩大的底层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生育率急剧下降、除非洲大陆外几乎所有地区人口都在快速老龄化，再加上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从任何可公开承认的视角来看，这一系列状况都很难被视作政治上的成功。

那种将数十年间持续增长且广泛扩大的繁荣归功于代议制民主（却并未因随之而来的生态破坏而对其加以否

定）的观点认为，即便不能确保集体繁荣，这一政治模式本身至少也具备实现集体繁荣的能力；甚至连经济学家也颇具影响力地断言过这一能力。[4]如今，在累积的经验的强力佐证下，人们普遍认为，代议制民主已越来越无力提供此类成果。这一普遍判断凸显出一个事实：过去的繁荣本就不大可能是由该政体形式本身所促成，并迫使人们追问：它是否还有望再次做到这一点。

“修复”（rehabilitation）这一范畴主要用于两大语境：一是重病后的康复，二是减轻监狱对囚犯本人造成的伤害，以及这种伤害在囚犯刑满释放后对社会其他成员造成的影响。再犯（recidivism），即囚犯获释后不久便极易重返监狱，这最能证明监狱实际上成了犯罪生涯的训练场。因此，在这一语境下，修复旨在帮助服刑人员具备应对狱墙外劳动力市场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它力图赋予他们一些此前或许从未拥有、但在适当帮助下仍可有效习得的技能，而一旦掌握这些技能，他们未来的机会将大幅增加。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他们执意选择继续犯罪，这些能力也可能反过来增强其犯罪技能与作案企图。已有证据充分表明，若认真推行修复计划，对所有相关方而言都利远大于弊。在医学语境中，修复是医学实践诸多重要分支的核心，此处的隐喻更为贴切：患者的原有机能可恢复到何种程度、持续多久、以及具体如何恢复？

相应地，将其应用于民主时，首先出现的问题是：这

些能力究竟指什么？以及，究竟哪种或哪些政体，可以确凿地、甚至合理地被判定为具备这些能力？对于上述每一个问题，我们都已深陷困境；而一旦我们意识到必须同时回答这两个问题，并且现在就必须给出答案，就会清楚地看到：我们必须在已然风雨飘摇的局势中努力尝试作答。

我的标题出于真诚，因此我并不将其视为一个关于规范性词汇的问题，甚至不视为一个关于学术界内外哲学史的问题，而是将其视作一个关于政治的问题。鉴于我是英国公民，却在日本谈论民主，我将这个问题理解为关乎两国所共有的政体形式：不是着眼于它们相对特殊的一面——目前两国均为君主立宪制——而是从普遍意义上，将其看作代议制民主：拥有近乎全面的成年公民选举权，新闻及其他传播媒介并非完全由政府控制，并且具备一套内容广泛的公民权利体系，这些权利在实践中至少能得到部分落实。

不同的国家、人口群体和地区会采用或放弃这一政体形式，在此过程中改变其空间与人口特征，但也有一些会长期维持这一政体。因此，时至今日，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政体类型，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它为何如此兴衰更迭。如今被称作政治学的这门学科，其大部分研究正是致力于此项工作。但如果深入探讨我试图解答的这一问题，该学科迄今积累的知识体系并不能提供太多答案。这并非因为政治学史上未曾汇聚众多极具智慧与精力、长期深入

思考这一问题的学者：从奥斯特洛格尔斯基、詹姆斯·布莱斯、马克斯·韦伯、约瑟夫·熊彼特[5]——他们中无人完全以这种方式自我定位，到格雷厄姆·沃拉斯、哈罗德·拉斯基、塞缪尔·芬纳、巴林顿·摩尔、斯泰因·罗坎、乔万尼·萨托利、吉列尔莫·奥唐奈、亚当·普热沃斯基、西达·斯考切波，[6]甚至在其后期部分著作中，弗朗西斯·福山在某种程度上也更深入地思考过这个问题。[7]在我看来，迄今为止，这些学者中最具启发性的著述当属亚当·普热沃斯基的成果：在迄今已超四十年的时间里，始终坚持不懈、细致谨慎，且坦率得令人印象深刻。但即便是普热沃斯基，也未能明确指明应如何聚焦我的问题。

目前很明显的是，长期以来，已有许多人出于各自不同的迫切需求，试图回答这一问题，而当下试图解答它的人，很可能比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多。出于非常明显的原因，1918 年时，很多人明确认为这一问题需要答案，1933 至 1939 年间，这么想的人更多了，1945 年及之后的几年里，世界各地又有许多人再度产生同样的想法。仅仅意识到这种反复出现的程度，就对思考这一问题有所助益。一个世纪内，以如此紧迫的程度三度重现的问题，其反复出现绝非偶然，也并非因为其学术表述不够精确。这些问题不可能仅仅关乎某个概念、范畴或理念。在政治语境中，这在一定程度上总是因为它们从来不仅是关于将会、可能或应当发生什么的问题，而始终也是关于

该做什么的问题。概念、范畴或理念无法告诉你将会或可能发生什么，因此，它们也绝不可能告诉你该做什么。

在当前语境中，“民主”指称三种截然不同的事物：它既是一个词汇，或是该词汇在不同语言中的译词；也是一组松散关联、杂乱多元的观念，其中鲜有格外清晰的，部分观念之间还存在尖锐冲突；它还是遍布全球、范围广泛的各类政体及其下属机构，这些政体与机构声称体现了其中某些观念，并借此获取其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有时极具强制性。[8]我的问题显然并非针对某个词汇，也无关乎这个词汇的吸引力或潜藏于其中、让人隐约感受到的诱惑性。

纵观“民主”一词的历史，其确定性不亚于人类经验中任何要素的历史，人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不带任何幻象地去认识它。到目前为止，相关史料已极为丰富，并且通过它已经发生了诸多具有明确历史意义的事情。其中有一小部分甚至已开始被可靠地认知。[9]

然而，对于它在时空传播过程中所表达并助推传播的那些五花八门的观念而言，情况则绝非如此。你可以从多种不同角度去理解为何必然如此，这些角度本身都不具备内在的权威性。其中最直观的方式，是借助柏拉图那段令人印象深刻的隐喻。[10]倘若理念确实存在某种形式（Form），那么绝大多数人显然缺乏洞察这种形式的能力，因此原则上，不可能通过认知途径向他们证实这种形

式的存在。对他们中的几乎所有人而言，这种形式即便能被证实，也只能依靠人为权威，而他们永远无法判断该权威的主张是否正当。基于信任的权威根本就不是权威，它只不过是信任本身。而信任，无论后续经验证明其根据是好是坏，归根结底都属于政治的范畴。

任何人都可以尝试为自己厘清这些观念，其中有些人显然更擅长让他人信服自己阐释的合理性。但人与人之间的说服力，更多是修辞（运用语言进行说服的能力）问题[11]，而非论证（通过逻辑加以证明的能力）问题。因此，霍布斯的宏大理想落空了。我们之中，没有人能理智地指望在柏拉图与霍布斯都看不到出路的地方取得成功。[12]于是，我们便陷入了政治本身的迷雾之中，任由词汇与始终愈发模糊的观念在其中盘旋流转。我们没有理由假设柏拉图或霍布斯比其他任何试图清晰思考民主的人更为聪慧，因此我们当然无法确定，是否有人对民主的理解与他们同样清晰，甚至更为透彻。但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即便真有这样的人，他们也无法、且未曾学会将这种清晰的理解完整地传递给其他人。至少在这一点上，迷雾将始终伴随我们，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只要我们存在一日，迷雾便会存在一日。人工智能可以做得更好吗？谁知道呢？但即便它可以，它也不太可能选择去做。它何必费这个劲呢？

那么，我们有哪些依据可以用来判断民主是否能够得到修复？我们可以相当确定地认为，民主不会很快从政治

话语中消失，它可能会继续存在，甚至以一种奥威尔式的、带有威胁意味的标榜而极为醒目地凸显出来，成为各类政权青睐的名号。这些政权或许仍会举行选举，就像弗拉基米尔·普京如今仍在做的那样；甚至会出现这样的选举——尼加拉瓜独裁者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某次在选举结果公布后，（大概是在私下里）对败选者说："你们赢了投票，但我赢了计票。"而就在最近，委内瑞拉也再次发生了同样厚颜无耻的情况，尽管气焰没那么嚣张。根据我们对人类本性的了解，长期来看，这类政权对其大多数臣民而言必然是一种威胁。如今的民主，并非作为一个词汇而需要修复。

如今，真正明显需要修复的，是自 19 世纪以来在西方扎根并从中发散的代议制民主形式。在全球范围内许多受其影响的人看来，这种政体在实践中的结果长期以来越来越令人不满。这在多大程度上是政体形式本身所导致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独立于该形式、且明显有损其运作的变革所导致的？它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望减轻这些变革所造成的损害，或是制定出新的实践方式来改善公民的生活？没有人能够回答所有这些问题，我也不能断言自己可以对其中任何一个给出确定性答案。但我确实认为，我们有可能厘清：这些问题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关乎政体形式本身，以及关乎构成这一政体的核心主张——而它若要在任何明确意义上称得上是民主，就绝不能放弃这一主张。

判断这一点最核心的依据是那些政体的历史，那些政体通过“民主”这一术语来定义自身，并且至少做出了一些明显的尝试去塑造其部分治理机构，以落实他们对民主所要求的某种诠释。没有任何政体是出于假定民主就是良善社会、良善经济乃至是唯一良善政治秩序的代名词而这样做。

这并非偶然。希腊词 dēmokratía 进入政治话语史时，并非作为某种“善”的名称登场。它最初只是对刚刚发生的事实的描述——在一个特定政治共同体内，政治权利的适度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变化。就我们已充分了解其部分后果的这个共同体而言，事实证明，这一变革在相当长时期内都颇为成功。它的成败催生出若干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即便该政体最终因军事征服而覆灭，这些思想依然流传下来。其中大部分思想对该政体形式的批判多于支持，但其中仍有足够多的思考视角均衡、富有启发性，阐明了民主在适宜情境下的潜在益处，使其在很久以后，能够在那些可能再度适用其优势的环境中，重新活跃于政治话语。

两千多年来，这些复兴的民主形式，无一达到现代领土国家那种政治权力结构与推定权威的规模。但至少从 1787 年起，即便起初并未直接作为政体名称，“民主”这一术语在制度设计分析与政治授权基础的讨论中已日益凸显。《美国宪法》并未将自身描述为民主政体，但很快，

该国全体男性政治家与公民便开始用民主来表述和理解它。欧洲各国以不同速度、怀着参差不一的热情纷纷效仿，其他大洲的广大地区随后也相继追随。直到最近，才有人将民主视为良善或公正社会的唯一形式，或是真正政治授权的唯一正当选项。在欧洲及其海外移民群体中，“代议制”这一截然不同的范畴本身有着远为漫长、制度上更为厚重的历史。因此，大多数属于民主范畴的历史性政治实践，都发生在围绕这些制度形式的恰当性、为其提出的主张的效力、以及对这些制度的控制权所展开的冲突之中。[13] 一个必然的结果是，作为一个范畴，民主在加剧政治混乱方面所起的作用远甚于其在促成政治明晰方面的作用。原因之一在于它如今需要厘清的范围之广；其二则是这一范围所注定带来的复杂性与模糊性。用于对其加以厘清的核心范畴，乃是国家这一范畴。

现代国家的概念最初源于一种反对叛乱的论点。这一论点的说服力自然会随具体情境中可供反叛的对象不同而有所强弱。其核心要义在于：在与他人长期共处的过程中，防范人身伤害、获取生存资料的需求具有绝对优先性。正是这一论点的持久影响力，使国家成为全球范围内最清晰、也最具深远影响的人类生活组织形式。这一概念最初被极为笃定地构建并宣扬，用以维护在位君主的统治——彼时君主数量远超其他类型的掌权者。但即便在当时，这一概念最有力的倡导者也承认，它同样适用于在位

贵族阶层，以及任何具备治理能力的民主政体，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暗含适用于英国下议院——彼时与如今一样，下议院名义上由人民选举产生。

自 1651 年以来，君主制已大体消亡，然而个人统治的现象却并未随之绝迹。贵族阶层这一概念如今既显得荒谬，又无端令人反感，而如何构建并维系民主国家，已然成为全球意识形态冲突的核心焦点。但从其他诸多视角来看，这一焦点的设定本就相当武断，尤其在世界各大宗教的视角下更是如此，更不必说那些数量远为众多的地方性宗教及其对立教派了。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世界宗教最终统治了整个世界，尽管至少有两大宗教曾为此不遗余力。迄今为止，它们唯一真正的世俗竞争对手——社会主义，仍未能找到适宜其安稳立足的疆域范围，也未能建立起它曾乐观宣传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现存最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直言不讳对其在全球历史进程中的成就作出了最有力的宣称：“中国：管用的民主。”[14] 这一表述的论战性通过其对立面——西方代议制民主模式——得以凸显：当前，西方民主模式正愈发明显地失效。这一宣称在某些层面看似牵强。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同样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地下水位快速下降、环境污染程度及其对民众健康的影响已然显现、人口快速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与生育意愿急剧下降，以及政府对待批评者与内

部异见者的方式。但任何近期到访过上海或北京的人，都不会认为这一宣称是空话。

社会拥有共同利益这一观念，在理论上模糊不清，在实践中也总是极具争议，但它既非空洞无物，也非无关紧要。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共同体，其所有成员对共同利益的认知完全一致；外界人士也几乎不可能替他们评判其中大部分利益（健康或许是一个重要的例外，而经济政策则是更易引发分歧与争论的领域）。然而，任何国家内部存在的这种认知差异，与其公民之间显而易见、极具破坏性的利益冲突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这些冲突源源不断地产生于塑造个体生活机遇的财产制度，并持续影响着塑造人们想象力、身份认同以及对自身可能拥有的生活之构想的环境。从世界历史的既定事实来看，任何国家的公民都能享有明确的共同利益，这一观点是荒谬的。不过，尽管这一观点的轮廓可能模糊，且事实也必将证明它会一直如此，但它对于这个论点而言仍是一项必要的前提——即人们按理应当同属一个国家，不应立即重新分配，以免对一个或多个其他既存或新建国家造成哪怕很小的伤害。领土与人口之间的适配性是国家这一概念所预设并认可的，但国家本身却无法为这种适配性提供正当性依据。一旦国家无法有效证明自身确实在服务于共同利益，那么对于所有未能从中受益的公民或公民群体而言，他们拥有脱离该国、加入其他国家的权利。

政治抉择的问题总是贯穿于政治分工之中，这种分工或是通过制度组织起来的，或是通过法律主张并阐明的，抑或是主要依靠习惯、欺诈或技巧来维持的。在此阶段，这种分工所能带来的最大希望在于，它能够基于我们共同所能达成的对当前利害关系的最佳理解，来规划我们需要做出的选择。这种理解的目的在于指导国家的行动——正如埃米尔·涂尔干所构想的那样，国家即“社会的大脑”：它最终必须汇集、分析并组织其分散的认知，以便以多种方式有效地为社会行动。[15] 这绝不能仅仅是表面功夫。若所讨论的国家恰好是一个代议制民主国家，那么要论证其采取这种制度的恰当性，就必须证明这是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成果，而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幻想或虚构。

作为一种理想模式，代议制民主预设了一种“液压模型”：对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理解能够畅通无阻地在全体成年公民之间上下传递，且传递过程中的任何环节都不受污染或毒害。然而，任何此类模型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它所指向的现实在每一个环节都包含着选择，而这些选择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阻碍、扭曲或污染那些被选择要传递的信息。我们至今仍没有一个切合实际的模型，能够解释这两种现实是如何像它们一直以来那样相互修复的；同时，我们也明显不愿承认这种相互修复的必然性。代议制民主作为一种政治模式，其历史上的成功在于它在多大

程度上巧妙地处理了这一根本性的混乱。至少，它显然不再能像过去那样有效地做到这一点了。是什么使其丧失了完成这一任务的能力？又有什么能够弥补这种无能，或者使其他历史上可能存在的政体能够更娴熟地执行这一任务，并因此获得更大的确定性？

在任何国家，阻碍其为绝大多数民众利益采取行动的最强大障碍，历来都是集中的经济权力。自 17 世纪以来，欧洲思想家便已认识到这一点，并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如今，人们对其在时空维度上的各种形式已有相当透彻的理解。在那些经济权力被大幅压缩、且未导致集体安全与繁荣出现灾难性下滑的地方，这种情况通常是通过自觉且相对自由的政治选择实现的。然而，出于种种原因，这一选择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已被逆转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并且在大多数环境中，这种逆转仍在继续，这往往也是通过相对自由的政治选择达成的。尤为明显的是，目前进一步强化了上述逆转趋势的是：向绝大多数民众传递信息的渠道已被极少数极其富有的私营企业大幅改变，这些企业大都在美国或中国。

迄今为止，我一直在思考民主制度在单一的、具有民族独立性的政治共同体（即我们现在所说的“主权国家”）的框架内，为其公民利益服务的能力。当然，这些能力从未仅仅依赖于任何特定国家内部的互动模式或权力结构。至少自 16 世纪以来，对于那些后来孕育出代议制民

主理念的社会而言，这种能力也日益依赖于一种全球性的所有权、生产和交换结构。这一结构既高度不透明、极度不稳定，又往往具有流动性。它以一种不对任何人和任何事承担政治责任的方式不断自我重构，因此，我们始终无法完全清楚它在多大程度上制约着任何特定群体的政治能动性。同样明显的是，这种重构会以大规模战争的形式出现，有时甚至达到毁灭性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毫不奇怪，国家原本肩负的首要责任往往变成了它再也无法履行的任务，而战争留下的伤害几乎会摧毁它本应保护的社会。在国内层面，国家拥有明确的合理性，且自身至少具备一定的发挥效力的可能。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强大到足以仅凭一己之力保护自身免受整个世界的威胁。

在其希腊起源中，民主是一种制度，旨在让那些在陆上和海上作战以保卫城邦的人，能够在无休止的战争中，自主选择何时以及如何进行防御。[16]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城邦共和国，选择成为公民民兵还是外国雇佣兵，往往意味着选择生活在自由之中，还是屈从于君主的统治。[17]在 17、18 世纪的英国，民兵仍被部分人视为抵御专制统治的关键保障。[18]即便在今天，以色列国防军虽带着明确的威慑力，也近乎是一个全民皆兵的国家，但事实证明，一个国家的民众武装程度高低，与该国的治理方式及治理成效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关联。如果一个国家的核心职责是保障其公民在本国境内的安全，那么在当下，武装民众显然无

助于完成这一使命。美国不仅是全球军事武装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其合法范围内的民众持枪率也位居世界之首。其直接后果是，美国公民无论长幼（仅除婴儿外），都有可能在厨房、学校或商场中，被他人意外或蓄意枪击，这种风险在世界其他地方绝无仅有。美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与古雅典或当代以色列毫无相似之处，民众的自我武装显然弊远大于利，对增强国家的外部安全也毫无助益。美国巨大的军事力量、持续稳定的国内经济生产力，以及与任何强大敌对势力相距甚远的地理优势，使其比世界其他任何地区都更能免受外敌的威胁。然而，基地组织摧毁双子塔的事件证明，即便拥有这些优势，美国也无法完全隔绝危险；而一旦热核武器被发明并在全球部署，任何国家的民众都不可能拥有绝对安全。只要生命存在，危险便如影随形。不过，即便美国在世界诸多地区制造了巨大破坏，其民众面临的外部危险仍远低于瑞士各州公民或摩纳哥的蒙特卡洛居民。

然而，在其他地方，无论是欧洲、亚洲、大洋洲，还是日本，代议制民主确实变得更加不安全。这是因为其意识形态对手的敌意加剧、军事力量上升，以及破坏和颠覆活动日益激烈。到目前为止，这更多是一个脆弱性加剧的领域，而非实际损害的累积；但这种平衡很容易向更坏的方向转变，而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它极不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这种情况已经迫使财政用于他用，而这些资金本可

用于安抚那些处境更艰难、对社会依赖度更高的公民。到目前为止，代议制民主作为一种模式，其吸引力的下降主要源于内生因素，是其自身运作的后果。但它如今已面临一些正不遗余力从外部对其进行破坏的敌人，而且他们未来很有可能在这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功。

正如我试图阐述的那样，这种恶化有两个主要根源：一是代议制民主越来越难以说服其公民相信，他们所受到的治理能给他们带来明确好处；二是公民自身严重受损的理解能力，使他们无法明白为何自己的前景正如所见那般恶化。第一个根源主要在于，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的治理并未给公民带来明显好处，这要么是因为政府经济政策的手段效果不佳，要么是因为生产性财富与金融性财富之间的再平衡，美国不断变化的税收结构更是强化了这种现象，必然会带来这一后果。[19]

悲观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中一个我已提及，即新的沟通模式与实践对我们彼此相处、认知世界、塑造思维能力以及改变思考意愿的方式所产生的影响。截至目前，这些影响的总体效果令人极度沮丧。它们本身正在削弱我们的理解能力，耗损我们彼此相处的能力，并使我们累积的焦虑与痛苦远超现实生活境遇所应引发的程度。推动这场加速蔓延的伤害的唯一机制，是“注意力的货币化”，以及由此促成的难以想象的财富规模与集中度。[20]这种财富积累所涉及的利益，以及这些利益所能施加的力量，已经对

民主理念本身构成了巨大的新威胁。即便是那些促成这一切的人当初也未曾预见，而且在任何时候，都无人能够完全想象到其全貌。如今，其危害性已显而易见，但我们仍有充足的空间尝试通过各种手段加以限制。在任何一个仍自称具有代表性的民主国家，应该不难组建并维持一个联盟，以极其紧迫的态度着手这一任务。归根结底，这项任务的政治层面并不像看上去那样新颖，它只是财富集中所带来的长期挑战中一个新的、更密切且更庞大的实例。但这种密切程度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它直击公民存在的核心，而我们尚不清楚公民还保有多少集体反击的能力。要有效监管这些巨头公司，使公民重获理解世界的能力，将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如果我们最终无法应对，也不足为奇。这在技术上或许不可能，但除非我们尝试去做，否则永远无法得知答案。这一挑战最残酷地落在了美国公民肩上，因为这些关键公司位于美国，而美国目前既是它们坚定的保护者，却又可能反复无常。应对这一挑战的关键在于民主本身的可能性，关乎公民能否重获保持自身自由的能力。

悲观的第二个原因则截然不同，且可能更具理论性而非实践性。那就是任何政体与时间本身的关系。代议制民主仅有 250 年的历史——远比君主制、暴政、贵族制甚至毫不掩饰的寡头制年轻得多。在这两个半世纪里，它用了相当长时间才传播到现今所覆盖的大多数大陆，而且起初

除了美国之外，它在其他地方都难以长久维持。从历史角度看，任何政体在 250 年后走向衰败都不足为奇，正如它现在可能正在经历的那样。政体失败的原因数不胜数，因为时间往往是它们的敌人，而非可以指望的朋友。传统，实质上是对习惯的坚守，对于那些试图治理国家的人来说，只有当这种坚守持续存在、且这些习惯依然有效时，它才是一种资源。当这种坚守动摇、习惯难以为继时，政体就会变得极度脆弱，很可能走向覆灭。不幸的是，或许与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相悖，法理理性也大致如此，甚至韦伯自己也承认，魅力型权威即便肯屈尊显现，也只能是一种不断贬值的资产。[21] 美国在其漫长的历史中，至少对相当一部分白人居民而言，曾拥有相当程度的法理合法性和传统合法性；但如今，这两者都岌岌可危、前景未定，而魅力型权威，则以一种极不具吸引力的形式存在，处于劣势一方。

很少有政治人物能够始终如一地将维护政体本身置于利用政体提供的机会来推进个人议程之上。所有政治政体从一开始就被人们激烈地钻空子，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其因果脆弱性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22] 没有理由期望任何政体能永世长存。正如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的那句经典名言：“罗马覆灭了，巴比伦覆灭了，欣德黑德也终将轮到。”[23] 正如我在开篇所坦言并将被证明的那样，我仍然无法告诉你们，民主能否在你们的国家或世界其他任

何地方重获新生。恐怕你们当中也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这在当今日本以及我自己的国家都至关重要，因为几十年来，两国的政府显然都在走向失败。虽然失败的具体方式不尽相同，且迄今为止失败的原因也多种多样，但有一点已日益清晰：两国失败的一个共同重要原因，在于公民选择让政府治理的基础是建立在一种令人不安的关系之上——即公民向政府提出的要求，与公民愿意提供以满足这些要求的资源之间的脱节。如果你要求过多，却不愿提供足够的资源来支撑这些要求，结果注定令人沮丧。尽管不同于“鱼烂从头起”的说法，不幸的是，正如柏拉图所警告的那样，民主制度往往也会从底部开始腐烂。[24]

我希望到现在为止，我已经让你们相信，民主能否得到修复对我们所有人都至关重要，因为人类在全球范围内给自己制造的困境如今已极其严峻。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并非政治失败和过错，而是人类累积的消费以及为实现这种消费而进行的生产活动的东西所带来的可怕破坏。每个公民或许本可以在方方面面做出破坏性小得多的选择，但直到最近，几乎没有人清楚自己究竟在做什么，正因如此，他们当初才会那样轻率地选择。如今，除非人们能明智而紧密地合作，否则甚至无法开始减缓灾难的蔓延速度，更不用说阻止这场毁灭性的雪崩，遑论着手逆转它持续造成的破坏。这对人类政治能力——即在彼此被迫共处的情况下为谋求更好生活而共同行动的能力——的挑

战，远比他们以往面临的任何挑战都更加艰巨。但换个角度看，同样真实的是，至少尝试去应对这一挑战的动力，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得多。

遗憾的是，这一角度完全不涉及个人层面，而从我们每个人赖以生存和选择行动方式的个人视角来看，否认现实的动机依然极其强烈，即便仅在单个国家层面开展协作，其现实挑战也几乎难以解决。

否认实际上会削弱任何尝试的动力，而任何形式的政治自始至终都充斥着扭曲的利益驱动。[25]即便世界上每个人都深切希望为人类自身谋求长远的未来，且这份渴望强烈到足以让他们将此努力置于自身生活中的所有便利与责任之上，人们对于如何妥善实现这一目标，依然会产生尖锐且近乎固执己见的分歧。

人们在政治活动中造成的大量伤害，虽是有意为之，却并非蓄意作恶。他们的行为实际上造成了损害，但他们这么做并非为了造成这种损害。不言而喻，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破坏，以及引发气候变化的种种行为，完全属于这种情况。我们如今日常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几乎很少能保证不加剧这种损害，但即便是品性最恶劣的人，也从未完全设想过这种情况，更不用说有意为之了。当大卫·休谟洋洋得意地宣称“宁愿毁灭整个世界，也不愿让我的手指被扎一下，这并不违背理性”时，他以为自己是以引人瞩目的方式，提出了一个新颖的哲学观点。[26]他从未想过自己

是在宣称自己是个精神病患者，或者煽动他人加入他的极端堕落之中。

就否认具有强制性而言，只要它在政治劳动分工中存在，就必然会造成危害，而限制这种危害的挑战也必须相应地进行分配。当前全球运行的代议制民主在应对这一挑战时表现得极为糟糕，但全球范围内的专制制度在这方面往往败得更惨，这绝非偶然。作为一种政治分工形式，专制制度如今占据了历史上王朝君主制曾占据的位置，凡是君权神授观念已被嗤之以鼻、王朝继承显得荒诞不经的地方，皆是如此。在专制制度历史进程的较晚阶段——尽管至少在中国要早得多——“启蒙可以优化君主制的优势，甚至缓解其部分缺陷”这一观念曾一度具有合理性。一个人或许能因幸运的机缘而受到启蒙，但即便借助最理想的机缘，也无法合理指望启蒙全体人民，而且人们有理由怀疑这一观念本身是否根本就不自洽。启蒙不只是掌握实用技能、具备高水平读写与计算能力。最重要的是理解力，一种分布式的理解能力。

从这一视角来看，开明专制或许是人类最可期的希望。世界其他地区但凡有机会选择的各类专制形式，无一例外都将与开明背道而驰——它们被工具性地、强迫性地束缚在蒙昧主义的极端中，将黑暗奉为一种彻底的信仰主义承诺，把刻意的自我蒙蔽当作行事策略。快速推进，大肆破坏，却从不停下检视满目疮痍的残局。

代议制民主近来已证明，它并非实现集体启蒙的优良架构，但支持它的理由在于：它至少不会排除这种可能，依然愿意做出尝试，并对其设法习得的经验做出回应。对民主实践最乐观的设想，始终是将其视作一场集体自我教育的契机——教育人们认识共同利益的内涵，以及实现这些利益的途径。即便这与它历来的真实面貌相去甚远，至少这一愿景的方向是正确的。如今再问“谁来教育教育者”已然为时过晚。现在，我们必须共同自我教育，并且汲取这场教育带来的教训，否则我们必将走向灭亡——不只是每个人注定的独自离世，而是我们所有人很快将彻底、永远地消亡。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Plato, *The Republic*, esp. 206–215.
2. Fagiani, *Nel crepuscolo della probabilità*; Locke, *An Essay*, IV, xiv, 2, 673.
3.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4. Acemoglu and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ough now compare Acemoglu and Johnson, *Power and Progress*.
5. Ostrogorski, *Democracy*; Bryce, *Modern Democracies*; Weber, "Politics as Vocation";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6. Wallas 1908; Laski, *Authority in the Modern State*; Laski, *A Grammer of Politics*; Laski, *Liberty in the Modern State*; Finer, *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 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Rokkan, *State Formation*;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O'Donnell, *Democracy, Agency, and the State*; Przeworski, *Democracy*; Przeworki, *Crises of Democracy*; Jacobs and Skocpol (eds), *Inequalit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Stanton, "Popular Sovereignty."
7.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and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8. Dunn, *Breaking Democracy's Spell*; Dunn, *Setting the People Free*.
9. Innes and Philp, eds. *Reimagining Democracy*; Lebovitz, "Representation and Democracy."
10. Plato, *The Republic*.
11. Quintilian, *Institutio Oratoria*; Garsten, *Saving Persuasion*.
12. Hobbes, *Leviathan*; Skinner, *Reason and Rhetoric*; and Skinner, "A Genealogy of the Modern State."
13. Dunn, "Truth, Trust and Impression-management."
14.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2 April 2021
15. Durkheim,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Civic Morals*, 46–54 and 76–84, esp. 49 and 79.
16. Finley, *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
17. *Discourses*, Bk II, 20, 349 in Machiavelli, *The Prince and Discourses*; Machiavelli, *The Art of War*, Bk I, 29–32; Machiavelli, *The Prince*, Chs. XII and XIII, 42–51.
18. Robbins, *The Eighteenth-Century Commonwealthman*; Pocock,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Robertso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19. Cooper, *Counterrevolution*; Forrester, "I appreciate depreciation."
20. Zuboff,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21.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Ghosh, *Max Weber and the Protestant Ethic*.
22. Dunn, *The Cunning of Unreason*.
23. Shaw, *Misalliance*.
24. Plato, *The Republic*, 273–280.
25. Dunn, *The Cunning of Unreason*.

26.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2, 129 [Bk III, part iii, 3].